

七日談

（澳門篇）

澳門多語生態：話語權建構與文明啟示

吳志良

澳門作為中西文化薈萃之地，是一座豐富而獨特的語言實驗室，也是研究社會語言學的天然理想場所。中葡兩國政權移交的過程，又生動體現了語言和權力的關係。比較澳門回歸祖國前後語言政策，還可以看出「一國兩制」的巨大開放性和包容性。

今天，當我們回溯澳門語言研究三十載歷程，不僅是在梳理學術史，更是在解碼一座城市以語言為紐帶，完成主權回歸與文化重構的文明實驗。澳門大學程祥徵教授早年對回歸前「中文官方化」的全力推動和回歸後「雙官方語言」的前瞻性研究，充分揭示了澳門語言問題的核心——語言不僅是交流工具，更是權力結構的鏡像，是文化認同的載體，是話語權博弈的無聲戰場。

主權回歸與語言權力重構：歷史轉折中的話語權讓渡

澳門回歸前的獨特語言生態，是殖民主權話語的縮影：葡語壟斷行政司法領域，絕大多數人口使用的中文反而被邊緣化為市井語言。程祥徵等學者敏銳意識到，語言政策不單是技術問題，更是主權象徵的交接與話語權力的再分配。

首先是話語權的制度性轉移。一九九三年頒布的《澳門基本法》確立中葡雙語官方地位，從法理上終結了單語霸權。但法律文本的平等不等於現實話語權平等。過渡時期中文官方的艱難進程和回歸初期葡語在政府公文、法律體系中的慣性主導，折射出制度變遷與文化心理轉型的時差。

其次是語言消長的權力隱喻。從過渡時期澳門公務員紛紛學習葡萄牙語，到過去二十五年葡語使用人口從百分之四降至不足百分之一，而普通話普及率升至百分之五十以上（二〇二三年數據），這種此消彼長，表面是語言

實用性選擇，深層則是政治認同轉向與經濟話語權重組：普通話成為國家認同的紐帶，英語崛起則對應了澳門國際化金融定位的需求。

澳門實踐：多語共生中的話語權平衡藝術

澳門十分珍貴的經驗，在於以制度設計巧妙化解了語言權力衝突，成功構建了「多語分層共生」模式。

首先，法律領域展現「雙軌制」智慧：從回歸前法律條文以葡文為基準文本、中文譯本具同等效力，到回歸後法律條文以中文為基準文本、葡文譯本具同等效力，既尊重歷史法統，又保障主體語言權利；同時，司法系統雙語並行：初級法院中文審理超過百分之七十，終審法院尚保留較大比例的葡語程序。權力在語言妥協中實現平穩過渡。

其次，社會語用存在功能分層：政府公文在回歸前後分別以葡、中文為主，保障行政效率與公民賦權；商貿金融領域中英雙語並行，是全球資本流動需求；文化遺產中葡語留存，則體現了歷史記憶的符號性存續。

第三，教育領域推動多元認同培育：三文四語（中葡英+粵語）教育體系，使新一代既能用普通話對接國家發展，又以葡語維繫與葡語圈紐帶，更借英語參與全球對話，同時，繼續使用粵語保持當地的習俗和當地文化特色——多重話語能力即多重發展權。

話語權博弈的當代挑戰：警惕隱性權力失衡

澳門模式的成功常被簡化為「和諧共存」，但暗湧的張力仍需警惕：

其一是普通話推廣中的文化焦慮。粵語母語者面對普通話教育普及，產生方言文化式微的隱憂。需明確國家通用語推廣不應以消滅方

言為代價，而應建立「通用語一方言一外語」的功能互補生態。

其二是葡語的符號化危機。當葡語退出日常交際，僅作為法律術語或文化遺產存在，其實際話語權已被掏空。澳門需思考如何讓葡語超越政治符號，成為中葡平台和文明交流互鑒的經濟文化資本。

其三英語霸權的滲透風險。國際資本助推英語在高端服務業壟斷地位，可能形成「英語精英階層」與「單語基層」的社會割裂。多語社會應防範新的語言階級主義。

澳門經驗的全球啟示：構建「文明對話型」話語權範式

在單邊主義抬頭的世界，從殖民地轉變為特別行政區的澳門模式，彰顯超越零和博弈的智慧：

一是構建了「去中心化」話語權結構。拒絕任何一種語言的絕對主導，通過制度保障各語言在特定場域的權威性，實現「功能賦權」而非「地位壓制」。



二是實現了文化遺產的話語轉化。將葡語從殖民遺產重構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的超級聯繫人」，老街區葡文路牌、土生葡菜名稱等成為文旅IP——歷史創傷符號轉化為文化資本。

三是找到了「低政治化」語言治理路徑。澳門避免以政治運動推動語言更替，而是依託市場選擇與社會協商自然演進，為深層次語言衝突提供軟着陆方案。

結語：語言即命運共同體

以程祥徵先生為首的澳門語言學家三十年前種下的種子，今天已長成獨特的語言生態景觀：真正的語言平等，不在使用人數的多寡，而在於每種語言能否在文明譜系中找到不可替代的坐標；持久的話語權平衡，不依賴強制均質化，而需要建構「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功能共同體，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並且可以減少誤讀、有效溝通的話語體系。

此刻，我們面對百年不遇且變幻莫測的世界複雜局面，又站在歷史的一個關口，澳門的經驗頗值借鏡：當人類在語言衝突中陷入「巴別塔困境」，這座小城用二十五載實踐證明——多元不是分裂的詛咒，而是文明的解法；話語權從非你死我活的爭奪，而是一場永不停息的共鳴。如果我們循着這條路徑前行，相信可以構建出人類的共同價值。

◀遊客在澳門歷史城區遊覽。
新華社

追憶王火老師(上)



人與事

慕津鋒

十一月二十三日午夜，我突然接到阿來老師從宜賓打來的電話。我一看時間已是夜裏十一點二十八分，心裏想：這麼晚，阿來老師會有什麼急事？電話接通後，阿來老師聲音十分低沉，他告訴我：小慕，王火老師走了。我聽完一愣，前兩天我還和王凌老師微信聯繫，她說王老在ICU情況整體還比較穩定，讓我不要擔心。

這兩年，王老身體一直不是太好，也常去醫院治療，但他都挺過來了，我原想這次老人應該也不會有什麼太大問題。一個多月前的十月十八日，王火老師還親自去天府書展參加了「百年火鑄·文心永續——《火鑄文心：王火傳》新書發布會」。發布會上，王老精神狀態十分好，他不時地與朋友們交談、握手、合影、簽名，有說有笑。最後，還與好友李致一起上台為新書揭幕。那天，我看了成都朋友發來的很多視頻，看見王火老師狀態如此好，真為他感到高興。可新書發布會後不久，王凌老師就告訴我：王火老師又住院了。其後，王老身體狀態一直不是很好，但還算是平穩，我本以為他能熬過這個冬天，沒想到小雪的第二天老人還是走了。

我和王火老師相識差不多有二十五年，早已是忘年之交。他和馬老（馬識途）是我最為敬重的作家。相交二十多年，他們對我影響很大，從他們身上我學到了如何寫作，如何努力做一個有意義的人。

我的文學之路起步很晚，但常常得到王火老師的肯定與鼓勵，他告訴我做一個徵集作家文學資料的人一定要多寫，多動筆，無論是寫與作家的交往也好，還是研究作家或是文學資料也罷，只有不斷地寫，才能逐漸走近作家，才會有更多的話題，才能讓作家們更多地了解你。王火老師的話很有見地，這也是促使我不斷寫作的一個動力。這兩年，我寫了兩本新書，一本是《馬識途年譜》，一本是《沐光集》，書稿印刷前，編輯問我：可否請一位文學大家給題寫書名，為新書加持一下。我第一時間便想到了王火老師。當我把這個想法與王凌老師溝通後，王凌老師說她去問問爸爸的意見。兩次，王凌老師都很快回覆我：沒有問題！第二天，王火老師便為我題寫好了書名。

這天北京的風很大，呼呼的北風將樹葉吹向天空。我坐在書桌前翻看着《火鑄文心：王火傳》，王老的故事彷彿是一幅精彩的畫軸，在我面前徐徐展開。



藝象尼德蘭

王加

時隔九年重返慕尼黑，在老繪畫陳列館裏如老鼠掉進米缸般泡了兩個半天，仍舊意猶未盡。

隨着閱歷的增加及研究的深入，個人對館藏名作的理解和審美喜好有了很大差異，因此關注點也和之前三次到訪截然不同。比如，之前我對館藏的大量「弗拉芒原始派」（Flemish Primitives）收藏都沒什麼印象，也不記得在這裏看過漢斯·梅姆林（Hans Memling）那幅著名的《聖母七喜樂》（也有爭議主題應為《基督的降臨與勝利》，但以老繪畫陳列館官方為準）。

在焦點透視法還未成為西畫不二法則的時代，北方文藝復興藝術中有一種在同一畫面內以表現敘事內容連續性的表現形式，名為「異時同圖法」（德語：Simultandarstellung）。此種需要畫家將主人公在單一畫面空間內根據神話、宗教或文學作品中的故事情節反覆穿插於不同時間地點，進而實現完整敘事性的技法在我國傳統寺廟壁畫或手卷中同樣存在。事實上，「異時同圖法」可被視為連環畫和漫畫的前身，唯一區別在於畫中沒有翻页或分格，主角在一個畫面中重複出現。因此客觀地說，尚未被焦點透視「禁錮」的北方文藝復興尼德蘭地區的西畫，和我國傳統國畫有着不謀而合的想像力。在十五世紀生於德國、活躍於布魯日的梅姆林，留下了兩幅「異時同圖法」的代表作。一幅是收藏於都靈皇宮內薩包達美術館（Galleria Sabauda）的《基督受難圖》，另一幅便是掛在老繪畫陳列館展廳中的《聖母七喜樂》。

在完成《基督受難圖》十年後，漢斯·梅姆林在前作的基礎上如法炮製出風格相近的

異時同圖法

《聖母七喜樂》。這一源自中世紀虔誠宗教文學和藝術中關於聖母「七喜」的記述是北方文藝復興時期頗為流行的繪畫題材。在最近兩年先後直面兩幅名作之後，能夠總結出一些明顯的異同。梅姆林的兩幅「異時同圖」代表作均以尼德蘭繪畫中的鳥瞰視角呈現。相較於《基督受難圖》在五十六點七乘九十二點二厘米的小木板上以中世紀細密畫的傳統方式讓耶穌基督在二十三個場景內反覆「出鏡」二十一次來走完他的受難之旅，《聖母七喜樂》的尺幅更大，場景也更加——在近兩米寬的畫布上用二十五個獨立場景呈現了和耶穌基督生平相關的重要事件。而這一次，主角是聖母瑪利亞。從畫作左上角的天使報喜、左下角的耶穌誕生、前景居中而至的東方三博士來拜、右側旁邊的基督復活、右上方山頂的基督升天、右下角聖靈降臨在使徒和聖母瑪利亞身上、到右上角天堂的聖母加冕典禮，畫家以「W型」的敘事線路呈現了聖母一生中的「七喜」。耶穌基督和聖母瑪利亞雙主角的「異時同圖」，畫家需要二人的生平軌跡並行發展，不相互衝突且一目了然，也讓《聖母七喜樂》比《基督受難圖》呈現出更為複雜的敘事處理。

不僅如此，上述兩幅相隔十年的「宗教連



◀漢斯·梅姆林畫作《聖母七喜樂》。作者供圖

兒女的「翅膀」



客居人語

姚 船

朋友聚會，其中一位訴說：老了，兒女長大了，「翅膀」硬了，遠走高飛，平日已難得見面。神情雖然寬容，但也露出一絲無奈。

人生，從結婚組成小家庭，尤其是有了孩子，成了父母之後，已然踏上另一階段，肩上自然多了一份責任。時間、精力和感情，似乎都花在小朋友身上，一天天盼望他們快高長大。兒女的一笑一顰，一哭一鬧，都緊緊牽動父母的心。

從幼兒園到小學，從中學到大學畢業，父母用最真摯的感情，無私奉獻，伴隨着孩子成長。當兒女長大成入走入社會，有了第一份工作，做父母的自是心花怒放。當他們有了異性朋友，攜手走入婚姻殿堂，更是父母的高光時刻，終於如願以償，可以卸下重擔，臉上自覺或不自覺流露出驕傲和自

豪。

上面提到的那位朋友，前些年不幸中年喪妻，獨力撫養膝下一兒一女。兩個孩子生性聰敏，都學有所成，兒子當了藥劑師，成家立業；女兒從事金融行業，婚後隨丈夫到美國工作。這位朋友起初曾欣喜兒女「翅膀」硬了，可以獨立生活，飛向天空，自由飛翔。可是一段時間以後，當他們常「飛」出自己的視線，免不了內心又交織着矛盾。

這種時而滿足時而失落的感覺，對於老年人來說，也許是常態。想起兒女不負所望，不落人後，甚至出人頭地，往往心滿意足。對別人談起，滔滔不絕，臉有光矣；而當兒女久未回家探望，連一個電話也沒有，只有兩張老臉對望，甚至是一人枯坐的時候，又是悵然若失，徒生孤獨失望。這有點像古詩寫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

昏。」

中國人傳統十分重視親情，期望三代同堂、四代同堂，這是人之常情。不少老人依然保持着「活到一百歲，長憂九十九」的觀念，兒女年歲再大，在自己眼中仍是小孩，需要父母的照顧、庇護，要聽父母的話。他們希望兒女幸福快樂，也期待他們能陪伴自己頤養天年，熱鬧開闢度過晚年。

不過，希望兒女像風箏一樣，既能高飛，也不要離開自己的視線，在現今科技迅猛發展的時代，這種思維已遠遠落後於現實生活。「同堂」已不同於同一屋檐下。兒女長大了，有自己的小家庭，有自己的生活圈，不可能天天陪父母左右。其實，只要他們心存父母，無事少見，有事能到，平時少些聯繫又何妨？

所以，父母在兒女長大成入，欣慰之

餘，也要及時轉變心態，學會在新的環境下，為晚年創建屬於自己的天地。看書寫字、種花養草、唱歌跳舞、好友聚會、旅行遊玩……做自己喜歡又力所能及的事。父母的安樂，讓兒女少擔憂，這也是親情和愛的延續。

我很欣賞歌唱家佟鐵鑫唱的《夕陽紅》這首歌：「最美不過夕陽紅／夕陽是晚開的花／夕陽是陳年的酒／夕陽是遲到的愛／夕陽是未了的情／多少情愛化作一片夕陽紅。」兒女長遠走高飛，不在父母身邊，做父母的除了掛念，也不必過分傷感，因為它並非代表自己衰老被遺忘，而是人生路上又一段新歷程的開始。卸下肩上的重擔，同時必須放下心頭不必要的憂慮。

兒女羽翼豐滿，在廣闊天地飛翔；作為父母，也應該努力放飛自己。